

汪学群著

清初易学



商務印書館

清初易学

汪学群著

商務印書館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易学/汪学群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ISBN 7 - 100 - 04248 - 8

I. 清… II. 汪… III. 周易—研究—清代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8269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清初易学

汪学群·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 - 100 - 04248 - 8/B · 616

2004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 33.00 元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5
一、经道合一的提出	5
二、经道合一的特色及内容	10
三、从经道合一看清初易学	20
第一章 明遗的宋易学	30
第一节 孙奇逢的易学	30
一、治《易》在于明理	33
二、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41
三、迹之学与心之学	50
四、危惧为心而天下平	60
第二节 方以智的易学	73
一、倚数穷理	75
二、太极不落有无而气不坏	81
三、有知反因即公因	88
四、全《易》皆天道人事	94
五、治教即心法	103
第三节 王夫之的易学	111
一、申文周孔子之正训	113
二、两间皆实有	118
三、推陈致新	127

2 清初易学

四、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	134
五、明得失存亡之理	142
第二章 明遗的程朱易学	151
第一节 刁包的易学	151
一、统四圣二贤之《易》以言道	152
二、天地者，《易》之法象也	162
三、洁净精微《易》教也	168
四、君臣应有孚	181
五、创制立法而有备无患	188
第二节 张尔岐的易学	197
一、略事言理之象	198
二、圣心之易即天命之易	206
三、以《易》穷理尽性	213
四、确立仁义礼诸德	221
五、国之久存长治之道	229
第三节 钱澄之的易学	245
一、博中有约	249
二、画卦生蓍明象	256
三、体《易》所以穷理尽性至命	265
四、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276
五、贞下所以起元	284
第三章 明遗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	294
第一节 顾炎武的易学	294
一、复程朱之书以存《易》	296
二、学《易》主实用	300
三、天道与性不虚行	305

目录 3

四、以德修身而求治世	311
第二节 黄宗羲的易学	318
一、辨河图洛书说之非	320
二、辨先天太极诸说	326
三、观象而明理	333
第三节 黄宗炎的易学	341
一、批宋图学三派	343
二、辨儒佛之心性	351
三、四德尽为君子之躬行	363
四、藏天下于天下	370
第四章 清廷的程朱易学	381
第一节 《易经通注》	381
一、易之妙通贯乎天人	383
二、正天下必先正己	389
三、《易》为圣人持世之书	394
四、明处忧患之道	401
第二节 《日讲易经解义》	407
一、斯人道即天道矣	410
二、德崇而业广	418
三、《易》本在于用世	428
四、持盈保泰	440
第三节 《周易折中》	448
一、折中于朱熹	449
二、准天之道推生民之用	453
三、言《易》穷理尽性至命	463
四、君臣交以实心	471

4 清初易学

五、鼎在庙之中	478
第五章 儒臣的程朱易学	485
第一节 张烈的易学	485
一、因象设事,就事明理	486
二、全其本心而自明	496
三、沟通天下之心志	504
四、治危乱,崇法礼	513
第二节 陈梦雷的易学	521
一、天地者未画之易,易者已画之天地	523
二、万物唯人最灵	532
三、进德存诸心,修业见诸事	539
四、措之天下而有功	546
第三节 李光地的易学	557
一、推四贤而尤尊朱	560
二、《易》之作所以则乎天地	567
三、天地之心者,道心也	575
四、德得于心,业成于事	583
五、皇上体《易》至,用《易》神	591
第六章 儒臣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	601
第一节 毛奇龄的易学	601
一、道学实道家之学	603
二、三易之说	610
第二节 胡渭的易学	616
一、唯《易》则无所用图书	618
二、辨先天诸易图	626
三、学《易》正宗	629

目录 5

第三节 李塨的易学	634
一、驳河洛先天太极诸说	636
二、假象而明人事	643
三、六艺实学	653
结束语	663
后记	668

前　　言

目前国内易学界对清初易学研究的状况是，仅限于对个别易学家的探讨，而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或者说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几个重要的易学家，而没有对其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以清初易学为题，想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力图填补这项空白，或许对进一步推动清初易学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特色。

研究的范围主要是顺治和康熙两朝，即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近八十年间撰写刊行的易著。这一时期易学著作，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丛书所收，不下数百种，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涉及。本书取材主要以《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为主，因为《四库全书》所收易著，大体反映当时的易学现状。对《四库全书》也非全选，而是选择十多位有影响的易学家或易著。另外也挑选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个别易著，综合起来，可以说代表清初易学的主流。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作为清初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易学与其密切相关，清初经学的核心是经道合一，经道合一论也必然对清初易学产生影响。从经道合一角度看清初易学，则揭示当时易学的基本特征，这为深入了解清初易

2 清初易学

学提供了宏观的参考坐标。本书结构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它们是明遗的宋易学、明遗的程朱易学、明遗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清廷的程朱易学、儒臣的程朱易学、儒臣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这六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

依政治倾向，可分为两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讲明遗的易学，即生活在清初的明代遗民的易学。除孙奇逢外，其他明遗如方以智、王夫之、刁包、张尔岐、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等，大都生活在明万历中后期，约 1600 年至 1620 年，尤以 1610 年至 1620 年居多。也就是说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他们大都在二十多岁至四十岁之间，其政治思想已经形成，清兵入主中原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家国变故，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国仇家恨使他们大都对清廷采取抵制与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的易学多在借《易》发抒亡国之恨，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后三章为第二部分，主讲清廷及儒臣易学。清廷易学指由清廷组织撰写的《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这三本书代表清初官方意识，因此亦可称为官方易学。儒臣易学是儒臣个人的易学。与明遗相比，清廷易学的参与者（除满族贵族外）和儒臣（主要有张烈、陈梦雷、李光地、毛奇龄、胡渭、李塨等）应属晚一辈。他们（张烈、毛奇龄除外）大都生于崇祯至顺治年间，明清易代时，有的尚小，有的未生，总体上说没有经历社会变故所带来的震荡，因此大都与清廷采取合作的态度，开始仕清。他们的政治取向决定其易学，即便是通经致用，也缺乏明遗那种批判精神，而转向借《易》向当权者提供建设性意见，为清廷服务。

从学术宗旨角度可分为三个部分，它们是宋易学、程朱易学、批评与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与清初学术直接源于宋明一

样,清初易学也源于宋明易学,所不同的是宋明学术争程朱与陆王,因陆九渊与王守仁都没有系统地解《易》著作,所以宋明易学起主导地位的是程朱易学,尤其是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不仅影响宋明两代,也对清初易学产生重要影响。清初易学无论是褒程朱还是贬程朱,皆以程朱易学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使是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与考辨,也不是一概否定朱子易学(除毛奇龄外),他们大都抛弃的是朱子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先天太极说部分,对其中包括义理的其他方面还是肯定的,至少不否定。从这个意义讲,与其说他们的批评与考辨开启乾嘉学者复兴汉易的先河,不如说这种批评与考辨客观上帮了乾嘉汉易的忙。

本书还体现了两个结合。其一是社会史与学术史的结合。从宏观上讲,把清初易学置于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清初易学与明清之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清初易学除了有易学史的渊源之外,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是当时的社会赋予其易学时代特色。从微观而论,每个易学家自己的社会背景又何尝不对其释《易》产生影响。另外,清初易学又与清初学术,尤其是清初经学联系在一起,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进而揭示了清初易学的学术特色。在论述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概括其学术,然后标明宗旨,从学术角度把握其易学。其二是文献与思想史的结合。本书虽然作为研究《周易》的思想史方面专著,但仍重视文献,从原著出发,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基础。在征引材料上,尽量全引,而非断章取义,考虑到前后大意,力图完整地把所研究的对象再现出来。在分析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追述其治《易》过程,然后再研究其易学宗旨,重点在于揭

4 清初易学

示其思想,指出其贡献。易学家或易著在解《易》过程中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方面的见解注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

导 论

易学是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易学离不开经学，同理，研究清初易学也不能离开清初经学^①。清初经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经与道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谓的经指儒家的经本文，包括围绕着经本文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道指经中所蕴含的内圣外王之道，包括天道与性命、社会政治等思想。清初经学针对晚明以来经道割裂的局面，提出经道合一论，并通过经书辨伪、依经释道、通经致用诸特征表现出来。这不仅反映了清初经学特色，而且对清初易学产生很大影响。

一、经道合一的提出

经道合一的提出，既不是主观的臆想，也非一时的偶然之见，而是针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以来，经道分离这一客观现实而发的。经道分离造成以下两种后果。

第一，经道分途使经本身变成纯粹的八股制艺之文。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胡广等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宋元

^① 关于清初的时代背景，详见拙著《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人经说为本，排斥汉唐注疏，由朝廷颁布天下，作为八股取士之圭臬，使经与八股相结合，变成制艺之文，成为士子的制举手段，经日趋僵化。杨慎不无感慨地写道：“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穷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蠹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枝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人合为一事。”^①缺乏对经系统的学习，应付举业，猎取功名，不愿意对经文下苦功夫。这种风气在嘉靖时期尤为变本加厉，不但古经传生平日未睹见，即使当朝经术中传注义训亦一切抹去，真可谓“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②

第二，道本来包括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经学的基本主张是由内圣开出外王，而经道分离，则使道的这两方面变质。其一，内圣的属性逐渐走向空疏，流于空谈性与天道。明代心学主易简，反支离，正人心。陈献章主张“心即理”，注重“正心”，鄙弃书本，人如果能握契机，何必读大量的书，不要被书牵着走，读书要为我所用。王守仁讥讽读书是“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③ 其初衷是批判经学中的烦琐之风，对破除官方的程朱理学僵化模式有积极意义。但后学发展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学无术，满街皆圣人的局面，反而加剧了学风的浮薄，流于空谈。其二，作为外王的社会政治功能丧失殆尽，而明清之际的社会剧变，进一步加

^① 杨慎：《升庵外集》卷六十一，《举业之陋》，万历间杨有仁刻本。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麓草庐重刊本。

^③ 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标点本。

深了心学的社会危机。早在明亡之前，顾宪成就曾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生动的描写：“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①鞭挞了浮华不实的学风。入清以后，大多数儒家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学末流的空谈，变成与社会无关的学问。顾炎武尖锐地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②陆世仪把明末心学聚徒讲学不关心政事的积习，斥之为“晋人清谈”，认为，“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今人所当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③熊赐履、陆陇其、张烈、张伯行等人大都持这种观点，把明亡归结为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不关政事，因此对王学展开批判。汉以下经学与统治者的政事联系在一起，并指导政治，成为统治之术。明末以来，内圣与外王的疏离，使经学不切实用，致使政治腐败，世风日下。在内忧外患之时，经学失去了对政治的指导作用，最终导致国破家亡。

^①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一，《顾端文公遗书》，光绪刊本。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③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经道合一论的提出也有其思想上的源流。面对经道的割裂，明代中叶以来一些经学家给予批判，并初步提出经道合一的思想。罗钦顺说：“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赞《易》，言性屡矣。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圣人作《易》，以顺性命之理。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但详味此数言，性即理也，明矣！于心，亦屡言之。曰：圣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后语。曰：能说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说，洗心而曰以此。试详味此数语，谓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尝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犹为明白易见。故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也。”^①对于理学的“性即理”、“心即理”诸命题之辨，应“取证于经书”，如取证于《易传》、《孟子》等，阐发义理要以经书为圭臬、准绳，从经本文出发，自然可辨。若以己意裁断，便是“师心自用”，缺乏理论根据，流于空谈，既误学又误己。在这里“性即理”就是道，而“取证于经书”则是经，强调经道的相关性。

杨慎指出：“伊川谓治经遗道，引韩非子买椟还珠。然犹知有经也。后世治经求仕者，则所谓得鱼而忘筌，犹以筌得鱼也。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之。又谓格物者非穷理也。格物者格其物之心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是全不在我，全不用工。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②“买椟还珠”出自《韩非子·外储说》，“筌鱼之说”出于王弼解《周易》，杨氏把经与道的关系比喻为椟与珠、筌与鱼的关系，正如无椟不能买珠，无筌不能得鱼一

^① 罗钦顺：《困知记》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标点本。

^② 杨慎：《升庵外集》卷六十，《买椟还珠》。

样，它们应该密不可分，不能舍本逐末。又说：“逃儒叛圣者以六经为注脚，倦学愿息者谓忘言为妙筌。”^①对割裂经与道的两种偏向给予批判。

归有光写道：“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旁出也”。^②以为道载于经，反对离经讲道。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③又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④既然道载六经，那就应以经为基础、出发点，明经即明道，离经则无以见道。

万历年间，焦竑、陈第继之而起，以“明经君子”而著称一时。焦竑说：“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迨晚而学《易》，韦编三绝。曰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盖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学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汉世经术盛行，而无当于身心。守陋保残，道以浸晦。近世谈玄课虚，争自为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兴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谬。此如法不稟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⑤自孔子开始便倡导经不离道，道不离经。焦

① 杨慎：《升庵文集》卷二，《周官间诂序》，明万历十年刊本。

② 归有光：《归有光集》卷之二，《示徐生书》，《四部丛刊》本。

③ 归有光：《归有光集》卷之十一，《送计博士序》。

④ 归有光：《归有光集》卷之十，《送何氏二子序》。

⑤ 焦竑：《澹园续集》卷一，《邓潜谷先生经绎序》，中华书局1999年标点本。